

忆往事之二

回望流年

——
李新回忆录续篇



忆往事之二

回 望 流 年

——李新回忆录续篇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流年: 李新回忆录续篇/李新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13-1533-7

I. 回… II. 李… III. 李新-回忆录 IV. K825.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546 号

书 名 回望流年

——李新回忆录续篇

著 者 李 新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东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533-7/K · 279

定价 12.00 元



1997年9月现代史研究室为贺李新80岁诞辰合影

抗哉子遺八十翁日倚一酒血
吳龍澤而檣林心益壯按頸噴
氣恨無窮曾經滄海方
常行踏遍荒山今見枯
餘默性揚人性世道坎坷
趨大同

李新八十歲賦

八十感赋

抗战孑遗八十翁，
同侪洒血尽英雄。
弹雨枪林心益壮，
按头喷气恨无穷。
曾经沧海方为水，
踏遍荒山罕见松。
销除兽性扬人性，
世道坎坷趋大同。

1998年7月30日

于北京万寿路甲15号

前 言

近年来出版了很多回忆录。我看过的也不少，颇受教益。通过回忆录，使我对许多历史事实了解得更加具体和丰富。但是，大多数的回忆录都“隐恶扬善”，无论对别人或对自己，都是拣好的说，坏的不说或少说。其实这也难怪。人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关于自己，多半爱说“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至于“走麦城”，连提也不愿意提。对别人，一般地是爱说别人的坏话，能为别人说好话的并不多。因此“隐恶扬善”只要说的是真话，就应该说是不错的了。至于那些对谁当权，就为谁说好话；谁倒霉，就说谁的坏话；甚至伪造历史，取宠求荣，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回忆录”，一切正直的人，都认为它不屑一顾，虽然也能凭权势而畅销一时，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写回忆录，按理我是没有资格的。记得50年代末，我在成都帮助吴老（玉章）写回忆录。在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也住在成都金牛坝。既然住在一起，我就便过去访问了陈毅。他对留法勤工俭学记得很清楚，因此谈得很详细。他除谈了事实经过之外，还提出

7-2011/06

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他说：“赵世炎当时是党员，当我们在里昂被抓起来，关起来后，他却溜之大吉，一直跑到苏联去留学；而我们这批被捕的人，则被押送回国。他虽然是我党著名的烈士，我一直认为他当时这样的作法是不好的。领头的党员当逃兵，在群众中影响很坏。”陈毅由此更谈到我们的白区工作。他说：“我们的军队打仗，党员是冲锋在前的。但在白区游行示威，党员却躲在后面，把非党积极分子推到前面去，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党员。我们还认为这样很‘策略’。结果，非党同志为我们被捕，被杀头，使我们大大地脱离了群众。这样作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你们看，‘血的星期日’不是布尔什维克领着群众一起去流血牺牲吗？”陈毅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谈完后，我说：“陈毅同志，请你再谈一次，我给你写成回忆录。”他说：“写回忆录，我没有资格。”我说：“你是元帅嘛，怎么没有资格？”他说：“留法的时候，吴老已经是名流了，我还是娃娃呢。”因此，此后我没有再找他谈回忆录的事了。陈毅尚且说他没有资格写回忆录，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呢？

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研究历史的人。我认为写历史应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

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尽管有不少“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悠久的光荣而伟大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完全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对于那些“隐恶扬善”的回忆录，虽然并没有隐去真事，但它毕竟太不全面，我也应该就我所知，加以补充，以便后人对真像不致以偏概全。总之，我写回忆录是应客观的要求，至于够不够资格，我就不管它了。

我写回忆录的目的既然是这样，那它就不能像文学作品《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而要如实地把真人真事写出来。可是这样的回忆录是碍难发表的。所以我的回忆录都只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保存，并不想发表。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出版这本回忆录呢？说来话长。大概是1995年吧，组织上考虑让我离休。既然要离休，就得确定我的工龄。从前，我的工龄都是从1938年，我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算起的。对此，我一直没有计较甚至没有注意。后来，我发觉抗战前参加工作与抗战后参加的待遇大不一样，而且，提拔干部也是一个大界限。因为解放初，邓小平就要我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那就是副省长的待遇了。但吴老没有让我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定级别时，我就是行政

九级（以后一直没有增长），也不算低。那时人们对级别的概念不像现在这样浓厚，现在是连和尚、道士都有级别。现在既然要离休，工龄就不能不计算。现在是，凡参加过“一二九”游行、跟着喊过口号的都算参加了革命，而我那时是重庆学联主席，能不算参加革命吗？何况我们被开除学籍以后，留下来没有被开除的人，现在都被承认是参加革命了。因此我请党委进行调查，解决我的工龄问题。党委根据我写的回忆录《风雨巴山》，派人去四川调查，结果证明我写的完全属实，毫无虚假。四川当年从事学运的老同志们看见这篇回忆录后，都劝我将它发表。我说：“其中的真人真事，不隐去能行吗？”他们说：“没有关系，顶多，对个别的人，你替他改一下姓名就行了。”为此，我才准备在党史出版社出版我的《风雨巴山》。出版社的同志对我说：“光出版《风雨巴山》未免太单薄了，要出，不妨多出一些。”既然出版社愿意多增加一些内容，我于是便把这次的回忆录增加为《救亡与抗战》，把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1931—1945）这一段时期现成的几篇汇集到一起出版。这便是这本《救亡与抗战》出版的由来。

八年抗战，是我一年中最值得回忆的时期。无论是关于游击战争，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国共摩擦斗争以及整风运动等等，我都必须写，也准备写。例如我现在正写着的《中共北方局整风记》就是非写不可的。但要发表就很难了，大概要等10年以后吧？这并非是我的顾虑太多。我已年届八十，并且早已有安身立命之所，不

必为“稻粱谋”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只是因为其中说到的人和事，距今太近，有的还活着，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亲属还多嘛，何必要引起他们的不安呢？而且，有的领导人从政治上考虑，出版社从风险上考虑，都不愿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因此，我一定要写的这些回忆录，暂时只能送存党史机关，束之高阁。但并不是要“藏之名山”，而是要等到适当时机才把它发表出来。最好是等死后才发表。“死后是非谁管得”，那时候什么评论都听不见了，多么干净！张学良要把他的回忆录留到下世纪（初）才发表，其用意很深，也可以说用心良苦。我认为他这样做很明智，所以我的某些回忆录也要留待将来发表。

以上，我把为什么要写回忆录，为什么要发表这本回忆录，以及发表的回忆录为什么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不成样子），都如实地说明了。我写了这些，作为本书的《前言》，一则是请求读者谅解；二则是希望得到指正，以便今后能写得更好一些。

李 新

1997年4月

续前言

在出版这本新的回忆录（名为回忆录续篇）时，本拟写一篇新的前言，但一看原来的前言，内容仍不能去掉。如果重新再写，势必有许多重复。为此，就像书名叫续篇一样，前言也叫续前言。

在出版第一本回忆录的时候，我本来的意思，专名就叫《李新回忆录》，简单、明了而又朴实。但同志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应该有个引人注目的书名，于是便有了《回望流年》这个标题。为了封面美观些，在标题两边，分别又加上了两个小字的副标题：右上方是“忆往事之一”；左下边是“李新忆救亡与抗战”；并且找了一幅“一二九”游行的照片作为整个封面的背景。这样，封面是比较美观了，但标题字面的重复是显而易见的，可谁也不管它，我也来了个“吾从众”。

现在要出版第二本回忆录了，封面上的标题怎么办呢？我的意见还是和第一本那样：中间是《回望流年》，右上方改为“忆往事之二”；左下方改为“李新回忆录第二集”。但出版社的同志们认为那样太重复了！都主张把“第二集”改为“续篇”。既然大家都这样主张，我只好又

一次“吾从众”。

新书叫续篇，前言叫续前言就更合适了。续前言要说明的问题不多，主要有两点：

第一，原前言说有些事和人现在不宜说或不宜直说、多说，甚至要等到死后才发表。但现在一想，那样不对。必须当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应直接真姓真名地说到他，他如果认为不合事实，就可以起来辩正；如果等他死后我才写到他，那末，别人会认为我是捏造，尤其是他的亲属起来说我写的不合事实，则别人会相信其亲属而不相信我写的。因此，我这本回忆录写到了许多现在还健在的同志，并且其中有不少同志自己还写了回忆录（有的是著作或文章）。这样最好，让读者来评判谁写得真，谁写得假；谁写得偏颇，谁写得全面。书印在纸上，白纸黑字，当今和后世的读者总可以从中求得比较接近于真实的东西。任何欺骗，只能一时起作用，对少数人起作用；绝不可能永久对多数人起作用。

第二，因为这本新书的内容，在时间上包括了我的童年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所以小字副标题就取消了时间的限制，而总称之为回忆录续篇。

以上所述，就算是续前言吧。

1998年9月李新自序

目 录

百里之才	(1)
小 序	(1)
一、怎样看暴行	(2)
二、试胆量	(9)
三、施庄坐村	(16)
四、参军与战勤	(24)
五、全国土地会议	(31)
六、冶陶会议	(39)
七、解放永年	(47)
八、开门整党	(52)
九、生产推进社	(62)
十、难忘的三天竟日长谈	(70)
十一、告别永年 重访永年	(79)
编书记	(86)
——八角亭编书的回忆	
反右派亲历记	(109)
“四清”记	(120)
无限的哀思	(146)
——悼念邓广铭先生	

附：

故乡·童年	(154)
一、李家沟	(154)
二、太星寺	(157)
三、安富镇（烧酒坊）	(161)
四、大观小学	(167)
五、荣隆场·蒋姑爷	(171)
六、全县会考和考棠香中学	(180)

百 里 之 才

小 序

1956~1961年，我奉命和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等率领一批研究生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八角亭上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大家要我讲讲解放区的战争和土改情况，我便把在永年担任两年县委书记的经历向大家作了两次报告。大家听了很感兴趣，孙思白说：李新有百里之才，治理一个县是不成问题的。后来我把报告提纲写成了一个小册子（长篇文章），把它叫什么名称呢？一想，就叫《百里之才》吧。因为我自信在全国环境正常、每个县能有自治权的条件下，我是可以依靠群众，把一个县治理好的。但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并不存在，我的百里之才也无用武之地。全国解放后，我被调离地方工作，到大学里当教务长，到科学院编教科书。这是外行领导内行，并不是说我真有学问。对此，我有自知之明，深知这是中国特色，因此能虚心向大家学习，并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完成了任务。我常对大家说：我那个主编是挂名的，并不像历代史书的总编撰，而是和编史书的提调差不多，是编书的组织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特色就是如此。百里之才只能像我在永年那样发挥；编书，只能是外行领导内行，才行得通。这些都是我的经验之谈。现在，

全国实行改革开放了，希望事情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1998年9月，八十翁李新自序

一、怎样看暴行

1946年夏，我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已由薄一波主持，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到前方去了。原来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随后也到前方去了，改由王从吾接替。我仍回组织部工作。很快，王从吾要到冀南去任区党委书记。那时，邯郸市要我去作市委副书记，范方澜希望我到北方大学去作党委书记，但王从吾则希望我随他到冀南去作永年县委书记。我拿不定主意，就去问薄一波，他说由我自己挑。不过他倾向于我到永年县去，因为那里离邯郸很近，却被蒋介石收编的伪匪盘踞着，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大患。由我去永年任县委书记，可以协调包围永年的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可以与太行包围安阳的斗争相联系，共同对敌。眼看全面内战爆发，敌人将拼命打通平汉线，我们也应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不让敌人得逞。我听从了薄一波的意见，决定随王从吾到冀南的永年去任县委书记。

那时冀南区党委在南宫。王从吾起身到南宫前和我谈了一次话，说 he 已与三地委（永年属三地委）联系好了，要我先到肥乡三地委，随即到永年去，不必再到南宫去绕圈子。大约在“七一”前夕，我到了肥乡，见到了地委、军分区和专署的各位领导同志。地委焦书记原在太岳区工作，在北方局和太行分局时期就见过；分区张司令员和我是党校同学；都是老熟人。只有温专员过去不认识，但也一见如故，因为他为人很活跃，我们在吃饭的